读史札记

乾隆朝官修《西域图志》考析

乔治忠　侯德仁

《西域图志》纂修于乾隆时期，定本全称《钦定皇舆西域图志》，是清代第一部完整、系统的新疆史地学著述，史料价值与学术史地位均属卓特，但史学界至今未能重视和探讨，这是史学史和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缺憾。因此，本文拟作出初步考析，以期抛砖引玉。

一、《西域图志》的纂修及修订

《西域图志》的纂修，是在清初康、雍、乾三朝不断用兵西北边疆地区，终于取得根本性胜利，从而实现国家疆域大一统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。

清初西域地区的准噶尔蒙古贵族，其地方政权臣服于清廷，是清朝的外藩。康熙初年，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在内讧中登上汗位，以臣服于清中央政权为掩护，极力扩张本部势力，首先进攻青海的和硕特部，接着又于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出兵天山以南，吞并了元朝后裔建立的叶尔羌汗国，控制着天山南北至中亚地区。随着其势力的逐渐增长，噶尔丹政权的民族分裂野心也日益显露。

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）六月，噶尔丹在沙俄的支持下，以追击蒙古喀尔喀部为名，举兵南犯，深入内蒙的乌珠穆沁，并公然与清军开战，逼近距北京仅七百里的乌兰布通。于是月初的会战中，噶尔丹大败逃遁。康熙三十四年，噶尔丹再度挑衅，清圣祖御驾亲征，在昭莫多大败噶尔丹。康熙三十六年，清圣祖又一次亲征，乘胜歼击噶尔丹军，噶尔丹残部纷纷归降，噶尔丹在逃跑途中暴死。[①]至此，噶尔丹发动的叛乱活动被平定。

继噶尔丹之后，策妄阿喇布坦和噶尔丹策零父子先后继为准部首领。他们在实力有所壮大的同时，也走上了背离清廷，向临区扩张的道路。康熙末期和雍正年间，清军与准部军队又有多次交战与议和，自雍正十二年之后，双方经谈判划定了准部与喀尔喀蒙古的游牧区界限，暂时维持了一段时期的安定局面。

乾隆十年（1745），准部首领噶尔丹策零死去，其后准部上层贵族为争夺汗位多次发生内讧，互相残杀，不少准部支派的首领率部众内附。乾隆十九年冬，阿睦尔撒纳在与达瓦齐争斗失败后，带领部众兵丁两万余人投奔清廷。清高宗决定抓住有利战机，出师西北，彻底消灭达瓦齐分离势力，平定准部，以巩固国家的统一。

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，清廷以班第、永常为将军，分领北、西两路大军，分别以降附的阿睦尔撒纳、萨喇勒为先锋，分进合击。大军进至准部，准军望风归降，不少"台吉、宰桑或数百户、或千余户，携酮酪，献羊马，绎络道左。师行数千里，无一人抗颜行者"[②]，清军在几乎未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直抵伊犁。达

[收稿日期] 2004-4-20
[作者简介] 乔治忠（1949—），男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，天津 300071；侯德仁（1975—），男，苏州大学历史系讲师，苏州 215021

瓦齐率兵出逃，被维族首领霍集思擒获解往清营，后被押往北京。达瓦齐政权覆灭后，阿睦尔撒纳在清朝支持下成为首领，但却背信弃义，发动叛乱，公然率领叛军攻入伊犁。由于留守的清军人数甚少，一时损兵折将。清高宗当机立断，再次调集大军平叛。乾隆二十二年(1757)，平定准噶尔之役终于以阿睦尔撒纳逃死异域而告终。

天山以南为维吾尔族聚居区，信奉伊斯兰教，清代称之为回部。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，噶尔丹征服此地，将各部首领扣留伊犁。自此回部长期处于准噶尔部的控制之下。准噶尔部被平定之后，原维族首领的二子布那敦、霍集占，即大、小和卓，重新返回南疆统治回众。不久，他们杀害了清廷派来的使臣，发动了叛乱。乾隆二十三年（1758），清军由吐鲁番出兵平叛，大、小和卓兄弟率众逃跑，后被擒杀。清军进入回疆后，减轻赋税，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，得到了维族民众的拥护，因此清军迅速推进，“沿途经过村庄，回众皆献牛酒果饵”，“沿途回人，扶老携幼，道左跪迎”[③]。到乾隆二十四年，大、小和卓兄弟发动的叛乱被平定下去。

清朝从军事上平定了天山南北之后，汲取新疆地区首领降而复叛、反复无常的历史教训，先于南疆设参赞大臣，并派官员直接控制各地方政权，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），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，驻兵惠远城，总统南北疆事务，使天山南北处于清中央政权实际管理和强有力的统治之下。

康熙年间，清廷曾经在西洋传教士的帮助下，绘成《皇舆全览图》，然而哈密以西地区限于当时准噶尔部割据的实际情况而未能备载。乾隆朝，随着清朝大军胜利进军西北，前往新疆测绘舆图的条件已然具备。乾隆二十年(1755）六月，清高宗为此专下谕旨曰：“西师奏凯，大兵直抵伊犁，准噶尔诸部尽入版图。其星辰分野、日月出入、昼夜、节气时刻，宜载入《时宪书》，颁赐正朔。其山川道里，应详细相度，载入《皇舆全图》，以昭中外一统之盛。左都御史何国宗[④]素谙测量，著带同五官正明安图，并同副都统富德，带西洋人二名，前往各该处，测其北极高度、东西偏度及一切形胜，悉心考订，绘图呈览。所有《坤舆全图》及应需仪器，俱著酌量带往。”[⑤]清高宗的这个上谕，虽然尚仅仅设想补充《皇舆全图》[⑥]等图书，但已成为编纂《西域图志》的嚆矢。

乾隆二十一年二月，在何国宗一行尚未抵达目的地开展测绘之时，清高宗就谕令已在新疆平定准噶尔军中的刘统勋，协同何国宗考察新疆地理现状与历史沿革，编辑成书。谕旨曰：“今已擒贼奏功，刘统勋在军中无所职掌，当专办此事。现命何国宗赴伊犁一带测量，亦经面谕。著传谕刘统勋会同何国宗前往。所有山川、地名，按其疆域、方隅，考古验今，汇为一集。咨询睹记，得自身所亲历，自非沿袭故纸者可比，数千年来疑误，悉为是正，良称快事，必当成于此时，亦千载会也。”[⑦]由此可见，清高宗此时已经决定这项工作要“考古验今，汇为一集”，即另纂一书，不单单扩展《皇舆全图》。这道谕旨的发布，应视为编纂《西域图志》全部工作的开始。按刘统勋参与其事，就是受命主持编纂该书，故《钦定皇舆西域图志》卷首《凡例》称：“是书于乾隆二十一年丙子春，原任大学士刘统勋初奉旨纂辑”，惟当时尚未拟定具体书名而已。

遵从清高宗的谕旨，何国宗率领钦天监西洋人傅作霖、高慎思等专家进入新疆地区。他们会同当时驻于巴里坤军营的刘统勋，从巴里坤分南北两路前往伊犁，在清军的护卫下历经各种险阻，踏遍天山以北各地，足迹远至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吹河、塔拉斯河，获得了大量的系统的实地考察资料，并且测绘成相当精确的地图，补入《皇舆全图》。

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，清军彻底平定回部首领发动的叛乱，控制了天山南北地区。清高宗再次派出了测绘队前往新疆实地测量晷度，绘制舆图。测绘队由明安图[⑧]率领，成员中除西洋人傅作霖、高慎思之外，后又加派刘松龄前往。清高宗记述此事称：“乾隆乙亥平定准噶尔各部，既命何国宗等分道测量，载入舆图。己卯，诸回部悉隶版籍，复遣明安图等前往，按地以次厘定，上占辰朔，下列职方，备绘前图，永垂徵信。”[⑨]“按地以次厘定”，就是再行逐次实地测量，予以校订；“备绘前

图”是将前此所绘新疆地图补充完备，即不仅校订已经绘成之图，而且测绘天山以南“回疆”的地图，此项测绘工作于乾隆二十五年结束。[10]整个新疆地区舆图完成后，皆载入《皇舆全图》，而同时也采用于《西域图志》。

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）六月，清高宗谕令：“刘统勋、何国宗所办《西域图志》，交军机处方略馆办理。”[11]以此推之，从测绘完成到乾隆二十六年六月这一段时间，必已在刘统勋、何国宗主持之下纂辑《西域图志》稿，书名亦应于此期间确定。此时交由军机处方略馆办理，总裁已改为军机大臣傅恒，纂修的规格上升。至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）十一月底，《皇舆西域图志》四十六卷告成。

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），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活动展开。这是规模空前的图书整理和文化总结活动，《西域图志》自当写入《四库全书》，而写入《四库全书》之前，是书被严格审核，认真修订。关于修订情况，今仅见简略记载，即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）二月二十九日，命福康安、刘墉为《西域图志》总裁官；六月二十八日，又改派于敏中、英廉、钱汝诚为《西域图志》总裁官。[12]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初十日，《西域图志》五十二卷改修完成，大学士英廉等遵旨奉表恭进。[13]清高宗命将《西域图志》交由武英殿印行，并缮入《四库全书》，称《钦定皇舆西域图志》，是为定本。《四库全书》本《西域图志》面世之后，乾隆二十七年的初修本原书今已难以觅见。

二、《西域图志》体例安排的编纂意旨

据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）告成的《国朝宫史》卷三十记载：“《皇舆西域图志》一部……厘为十八门：曰天章，曰图考，曰列表，曰分野，曰疆域，曰山，曰水，曰官制，曰兵防，曰屯田，曰贡赋，曰语言，曰字书，曰音乐，曰服物，曰风俗，曰土产，曰外藩。凡四十六卷。”这是乾隆二十七年告成的初修本状况。而《四库全书》本《钦定皇舆西域图志》则为五十二卷，卷首四卷为“天章”，以下依次为图考三卷，列表二卷，晷度二卷，疆域十二卷，山四卷，水五卷，官制二卷，兵防一卷，屯政二卷，贡赋、钱法、学校各一卷，封爵二卷，风俗、音乐各一卷，服物二卷，土产一卷，藩属三卷，杂录二卷。[14]分设二十门类。其中“天章”、“图考”、“列表”、“疆域”、“山”、“水”、“官制”、“兵防”、“屯政”（初修本为“屯田”）、“贡赋”、“风俗”、“音乐”、“服物”、“土产”、“藩属”（初修本为“外藩”）计十五门共有外，《四库全书》本中另有“晷度”、“钱法”、“学校”、“封爵”、“杂录”等五门，而初修本的“分野”、“语言”、“字书”等三门，盖以“晷度”取代了“分野”，将“语言”、“字书”归并入“杂录”之中。《四库全书》本《钦定皇舆西域图志》，乃为该书的最后定本。两处记述《西域图志》体例标目的不同，反映了初修本与最后定本的差异，从中可以窥知，该书初修虽已经历了十分慎重的酝酿设计，而至纂修成《四库全书》时期，又经过了比较重大的修改。

清代乾隆时期，地方志的编纂已经达于兴盛、成熟的程度。《西域图志》在体例上参照了中国古代方志的传统和清朝方志纂修的经验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但与其他方志不同的是：《西域图志》在皇帝亲自关注下由朝廷修成，规格甚高，而且是从全国一统的视野来考察西北方隅之地，在体例和编纂意旨上都具有值得注意的特点。

第一，配有地图，系以图说。《西域图志》编纂者认为：“山川方位，远近形势，匪图弗显。图举其形，志详其事。”[15]是故“兹辑图志，用尺幅为缩本，复据驻防大吏各就所辖分绘互勘，形势倍显。总图所未能悉者，重以分图。图所未能赅者，系以帖说，而山川端委，则务观全局。源流脉络，灼然可寻。藩属疆索亦列简中，用昭环拱之盛”[16]。该书配有地图三十三幅，“自幅员所界以及符节所通，共新图二十有一，又附历代旧图十有二。古今互校，益昭圣朝拓宇之功”[17]。这些地图分为行政图、地形图、藩属图和历代西域图四类，且各图皆“缀论说，以为全书提纲”[18]。在舆地之书中附有地图，本是久已有之的传统，而《西域图志》强调地图必系以图说，则为卓见，在地图绘制未规范化和地图知识未为普及的情

况下，配备图说是十分必要的，有精致的图和详明的图说，才能真正起到“以为全书提纲”的作用。观“图说”的内容，皆将地理考察与史地考证的结论予以概述，题以《图考》的标目是恰如其分的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：本书不仅收载清朝绘制的地图，而且收录历代旧图，以往各个朝代对西域的经营与认识范围，从中大略可见。即清朝的《皇舆全图》亦有两幅，一图不包括西域地区（应为康熙年间绘成），另一是新绘西域地区的地图，展示清朝对西域控制的前后两个阶段。这表明编者有意识地通过地图来反映地理疆域的历史性变化，在考察地域的空间观念内融入“历史”的时间观念，充分表现了本书“地”与“史”有机结合的撰述旨趣。

《皇舆全图说》开篇便指出：“中华当大地之东北，西域则中华之西北，为大地之北境也。”[19]这种地理位置观念，放弃了历来以中国为“天下之中”的观念，是上层统治者改变“中国中心论”思想的最早萌芽，既表明西方地理学思想对中国影响的加深，也透射出国力兴盛之际敢于正视事实与新知识的气度，具有值得注意的理论意义。但可惜的是后来的历史发展，未能将这一思想萌芽发扬光大。

第二，分列诸表。本书编撰者认为：“史必有表，所以详世系，纪沿革也。自《五代史·职方》考其疆域分併之跡，具列如谱，后世作地志者亦开有列表”，但是由于西域地区和“中土通绝不常”，因而“史家记载荒略，率传而不谱，故自西汉以来，两千余年之沿革……征信无由”，而今清廷“戡定西域，建设府、州、县，自昔曶爽闇昧之区，分疆别界，几与内地形势相埒，因得详其端委。用《皇朝一统志》十九省之例表之”[20]。本书诸表共计十五项，占有两卷篇幅，其中卷四为安西南路、安西北路和天山北路，卷五为天山南路及其藩属，“上起秦汉，下迄元明”，其目的是“以明国土之分合，建置之沿革”[21]。这样，诸表“以时代为经，以古今郡国为纬，纵横求之，较然可睹”[22]，可以简明地表述出地域区划与行政建置变动的历史。

“表”本为记传体史书创立的一个组成部分，记载职官、人物、世事兴替等，义取简略明晰。方志亦有仿照纪传体史书立表者，但是以“表”清理地理政区的发展沿革，无论史书还是方志皆极罕见。本书设置这样内容的《列表》，在一方史地之书的编纂上是一项创意，编者声称是以《新五代史·职方考》和《大清一统志》为先例，恰好表明乃经过认真的斟酌与全局性考虑，使编纂《西域图志》取同于《一统志》的思路。《列表》进一步增强了地理记述的历史性内容，与《图考》相配合，共同起到了对于全书的提纲挈领作用。

第三，体例安排以及编纂意旨。从《西域图志》二十门类的设置来看，《天章》收载清高宗的御制诗文，恭列首卷，这是皇权专制主义在史学上的体现，清代许多地方志都将这类内容设于首卷。但《天章》在立例上亦有创新，即并非将清高宗所有诗文皆载于卷首，卷首仅载“统论西事全局者”，分为四卷，而那些“因地纪事，即物抒怀之篇，分载各卷”[23]。然而《天章总目》中，则将清高宗所有有关诗文（即文 16 篇、古今体诗 325 首、赞 50 篇）逐一开列题目，注明所在卷数，起到索引的作用。例如卷首只载文 6 篇，其余 10 篇分载于有关各卷，诗作亦择“统论”性的载于卷首，其余多数御制诗歌随事、随地散载于各卷，但从《天章总目》中查找，皆十分方便，既避免了卷首篇幅过于膨胀，又不有失于对皇帝的恭敬，且使卷首与正文的内容有机地结合一体，全书处处都存在着皇帝的诗文，象征朝廷对西域局面的全方位的掌控，在统筹部署上颇为成功。

在“天章”之下的体例布局上，本书先是统括性的图和表，随后是地理位置、疆域、山水等自然状况，接着为官制、兵防等行政设置，其后才是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内容，呈现出有序的四个层次，具有体例、内容上周全、完整的特点。而在各部分的内容中，无不显示出西域与内地的联系、清朝对西域的控制、经营及其战功政绩，例如《疆域》部分乃将实地考察所得的城镇居处，与中国历代史书中的地理记载、史事记载对照考证，这不仅有着学术的价值，而且清晰地表现了西域地区与内地政权源远流长的密切联系。即使是《山》、《水》这样的自然地理部分，也记载了清廷平定与经

营西域的内容，如关于天山山脉的各个高峰，多载有清高宗或清廷的告祭之文，其中额林哈毕尔噶鄂拉是清军大败阿睦尔撒纳叛军之地，清高宗的告祭文称："四山草木尽助声威，诸岭风云俱增叱咤……信乎奉天讨以出师，明神咸佑。"对天山最高峰博克达鄂拉，清高宗先后撰三篇告祭文，反复申明清军"抚顺讨逆"、"辑宁函夏"的意愿与决心。[24]对新疆河流、湖泊的祭文，大多因其"灌平原而布惠"[25]，有益民生。这说明清朝认识到西域地区水源问题的重要，对水的致祭，是将经营、开发西域，置于与行政控制同等的地位。

自然地理性质的"山"、"水"赋予了人文的内容，被改造成为清廷控制和经营西域的象征，使《西域图志》体现出帝王大一统观念的编纂意旨。至于其他部分，更时时充斥歌颂清廷统一与经营西域功德政绩的内容，例如卷二十九《官制》记述清朝对新疆地区设官任职、实行严密管理的状况；卷三十二《屯政》记述了清朝在新疆"兵民并济"、"战守兼宜"的屯田政策，详列各年田赋收获，称伊犁地区"兹幸入圣朝幅宇，荷锸如云，土地日辟，时和岁稔，稌黍盈余。十数年以来休息生息，民庶物阜。乌孙故壤，始熙熙然成大都会矣!"在卷四十四《藩属》，记载各部首领觐见清廷的情景、表文、受招待的状况以及清高宗大量的有关诗文，形象真切地显示了新疆统一于清政权的局面。总之，《西域图志》全书贯穿着大一统观念、体现清廷统一和经营新疆的宗旨，其基调是宏阔的眼光与昂扬的精神。

《四库全书》定本距初修本之成书，相隔十几年，新增加《钱法》、《学校》等内容，意在彰明经营新疆在经济管理、儒学教育上的措施和成就，如《钱法》篇记述初定西域，铸钱仍依旧式，而随后即改从内地，正面为"乾隆通宝"汉字，背面是新疆各某钱局名称及当地文字，显示了国家货币流通的统一，以及新疆与内地经济联系的空前加强。同样，《西域图志》定本删去初修本中《语言》、《字书》二门，而将其内容归入《杂录》，亦具深意，这是不想从体例上突出西域地区原有的特殊语言和文字，更符合一统观念的需要。总之，《西域图志》定本的编纂，在体例安排上皆经仔细斟酌，十分认真，且不受原有成书的拘囿，其出发点是更深刻、周密地贯彻大一统观念和彰明清廷对新疆的有效统治以及经营成就。清乾隆年间战胜新疆地区的叛乱分裂势力，随即进行直接管理经营，维护了国家的统一，振兴了新疆的经济，推动了文化的发展，意义极其重大。《西域图志》的纂修是清廷统一新疆、经营新疆事业的组成部分，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作用。

三、《西域图志》的内容与学术性

清朝纂修《西域图志》是对新疆实施经营管理的需要，但其书体系完整，结构严密，将史地勘察、历史考订、官方文书结合参证，对西域地区的新知所得极富，所纠正的旧说讹误甚多，具备无可置疑的学术性。

（一）丰富的内容及其可贵的史料价值

《西域图志》五十二卷，内容包罗万象，举凡新疆地区的历史地理、政治经济、物产风俗、文化教育，靡所不备，堪称洋洋巨观。该书以地为纲，史地结合，特别记载了清朝经营、管理、开发新疆的各项措施和成果，汇总了清廷的有关文献，记载了新疆当时的各种社会状况，系统地清理了西域历史有关记载与史迹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

关于新疆诸地的疆域、形势、山脉走向、峰峦水流等自然地理状况，以及新疆行政地理的叙述，在书中占据核心地位，占有最大的篇幅，并且与卷一、卷四和卷五的《图考》相佐证。《疆域》部分在结构上将新疆划分为安西南路、安西北路、天山南路、天山北路四大行政区域，再分述辖内各个小的政区，从中央对新疆地区管辖和控制的实际情况出发，逐层叙述，纲举目张，井然有序，繁简得体，给人以全面、清晰、具体的认识，远迈于以往历代的记述西域地理疆域之书。各部分于记述地理位置、地貌、气候等状况的同时，突出主要城镇的建置、沿革及当地民情，如记载伊犁："伊犁在天山之阴，为准噶尔沃壤，距京师一万八百二十里……山川形势，甲于诸部。气候和暖，人民殷庶，物产饶裕，西陲一大都会也。

其俗皆逐水草，无城郭。惟所属回人，因其旧俗筑城以居……（乾隆）二十九年于伊犁河北建惠远城……（乾隆）三十年，建惠宁城……”㉖由于新疆境内山脉众多，河流纵横，多可成为特殊的地区标志，且对经营、开发该地区关系密切，故专立《山》、《水》予以记述。记述“山”、“水”赋予人文内容而体现帝王大一统观念，上文已作论述，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还追溯历史，搜集与保存重要文献，例如卷九《疆域二》就全文抄录了《汉敦煌太守裴岑祠碑文》。该碑文记载云：“维汉永和二年八月，敦煌太守云中裴岑，将郡卒五千人，诛呼衍王寿，斩馘部众，克敌全师。除西域之灰，蠲四郡之害，边境乂安，振威到此，立德祠以表万世。”卷二十对鸣沙山的记载和考辨，不仅相当详细地记述了千佛洞的状况，而且还收录了《唐朝散大夫郑王府谘议陇西李太宾碑文》（损缺52字）与《唐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□碑》，同卷“库舍图达巴”山的记载收录有《唐左屯卫将军姜行本勒石□□碑》，皆当时可见的唐代可贵文献。其中姜行本之碑立于贞观九年（公元635年）六月，记述他在西域的战功，可与《新唐书·姜行本传》相互补证，极具史料价值。至于清朝所立碑刻，载录更为丰富、完整，岁月沧桑，碑石也逐渐毁损，存于本书的文献就越来越成为宝贵的资料。

关于清朝经营、开发新疆的业绩，分布于《官制》、《兵防》、《屯政》、《贡赋》、《钱法》、《学校》等各卷，例如《官制》中详细记述乾隆年间在新疆不同民族地区，分别因俗制宜地设官任职情况及其演变，并且将复杂的官员设置予以条理化，正如修史馆臣所称：本书对官制“品秩既区，掌司咸载，考征故实，各以类从。将来稽典属之班联，仿西陲之职守，均于是编可详订焉”㉗，成为研究有关历史问题不可或缺的资料。

中国古代的史籍包括地方志在内，大多缺乏详细、系统的经济史数据资料，而在《西域图志》中，无论是兵额的多少、兵防台站的数目、官制的设置情况，抑或是屯田的亩数、赋税的额度、学校设立及生员的数量，都有详细、明确的记载，具有重要的政治史、军事史、经济史、教育史价值。例如《屯政》记载清朝在新疆地区实行的屯田，主要内容是各处屯田面积、屯兵数量，各地水土适宜的作物，屯田收获的粮食产量，特别是粮食产量，逐年登录数字，不厌其烦，旨在说明清廷开发新疆取得了可观的成果，史臣在伊犁地区屯田的按语即称：“伊犁之地，前代设屯史传无明文。《汉书》称其地莽平，多松樠。又言其俗不田作、种树，随畜逐水草，与匈奴同。非土田硗确不可树艺，亦其人之不务农业，自遗地利耳。兹幸入圣朝幅宇，荷锸如云，土地日辟，时和岁稔，稌黍盈余。十数年以来休息生息，乌孙故壤，始熙熙然成大都会矣。”㉘今天研究清史和新疆地区的历史，这些经济数据以及对新疆社会状况的描述，都是弥足珍贵的史料。

关于新疆准噶尔部和回部的发展由来及其社会生活、风俗民情，有《风俗》、《音乐》、《服物》、《土产》、《杂录》等篇卷，内容涉及了准噶尔部和回部民族历史与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叙述十分详细。其中多有独家记载，他处无闻的宝贵史料，例如《音乐》记述伊奇尔呼尔（胡琴）等等乐器的构造、尺寸及制作方法，《杂录》的“世系”部分记述新疆各部族首领时代传袭的谱系，《杂录》的“字书”、“语言”将准噶尔部和回部的文字、语音予以书面解说，都是特别重要的文化史资料。《风俗》、《服物》、《土产》等卷叙述新疆各族生活习惯、宗教信仰、道德法规及社会礼仪，生动具体，展示出别致的社会历史画面。

《西域图志》多处记载涉及了统一国家内新疆地区各民族与中央政权的关系，如《贡赋》、《封爵》记述的具体史实，体现了各族首领在经济和政治上接受中央政权的统辖。《藩属》卷不仅分别记述各族各部的历史和现状，而且大量记录新疆各部族首领觐见与上表，以及乾隆皇帝接见、宴请各部首领的题诗，都是新疆各族统一于多民族国家的真切、鲜活的写证。

（二）勘证考实、辨误订讹的学术成就

中国自西汉以来，史籍、文献中对西域的记述连绵不断，内容丰富，也存在着模糊、讹误与相互抵牾之说。清廷纂修《西域图志》，既进行实地勘测考察，又对历史文献中的有关

西域地区记载予以清理，两相参证，取得很高的学术成就。从整体而言，《西域图志》比此前所有史籍提供了对于新疆更为全面、系统、准确的历史和地理知识；就一些具体问题而言，《西域图志》对以往史籍的有关记述勘证考实或辨误订讹，具有引人注目的学术价值，加强了整体知识准确性，正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称："足以补前朝舆记之遗，而正历代史书之误。"[29]

《唐书·地理志》将碎叶城记载于焉耆都督府之下，《西域图志》卷十三辨析其误，指出"唐碎叶水为今之图斯库勒，所谓碎叶城当在今图斯库勒南水丰草饶之地"，从而考订出准确地点。[30]即使对本朝官修之史，亦认真核查讹误，毫无回护。如卷二十七《水四·天山南路》"博斯腾淖尔"（"淖尔"即"海"之义）条，引《汉书·西域传》、《后汉书·班超传》、《魏书·西域传》、《唐书·西域传》等书的记载予以考证，并且指出《大清一统志》（初修本）的疏误：

> 按：《一统志》称："焉耆国在今土尔番西，无疑。然土尔番西至葱岭并无大泽可当海之名者"，又谓"四面大山，海水曲入四山之内。其地更无可考"。以今求之，则博斯腾淖尔当土尔番西南，罗布淖尔又当博斯腾淖尔之南。《班超传》所谓"大泽"，《魏书》所谓"南去海十里者"，即班史所谓"近海"，应指博斯腾淖尔而言。若《后汉书》所谓"海水曲入四山之内者"，应属之今之罗布淖尔，在四面大山之外。与博斯腾淖尔相距约二百里，形势适合，方位道里，亦灼然不诬。盖自宋以后，中国无人使至其地，殊方隔境，考索为难，宜《一统志》误以为并无大泽，而以"无可考"概之也。[31]

卷十四《疆域七》"鲁克察克"条，在引述了《汉书·西域传》、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、《唐书·侯君集传》、《文献通考》、《元史·西域传》、《明史·地理志》等多种史书记载之后，经详细考证而指出："今鲁克察克本汉柳中地，戊巳校尉城……其城即汉戊巳校尉、后汉长史班勇所居，本属汉柳中地，是以唐为柳中县……《明史》称戊巳校尉在哈喇和卓，其说为无据矣。"[32]这种纠正各种史籍中史地记载讹误之处，不胜枚举，特别是对本朝官修史书的指摘和订正，说明《西域图志》并非仅仅为应和政治需要之作，而是充满了扎实的学术精神。

四、《西域图志》特殊的价值与地位

清乾隆朝官方纂修书史的活动连续不断，所成之书门类繁多，数量堪称古代之最。在这众多的官修史书中，《西域图志》具有特殊的价值、地位和影响，无论是从史学史、文化史还是一般的社会历史的角度考察，都值得认真进行分析、研究和评价。这里仅从边疆史地学角度及其科学性略作探讨，以待时贤指正。

（一）地理学科学方法与科学态度的体现

《西域图志》之纂修，是清朝对西域用兵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开始，而以大规模的地理勘测为前导。在对西域地区的地理勘测中，任用了傅作霖、高慎思等西洋人，采用西方先进的仪器和技术，力求掌握准确的地理状况。这首先是控制局面与经营管理的军政需要，但同时也使纂修《西域图志》有了一个具备科学精神的起点。

史地之书编纂的资料基础，一是得自历史文献，二是得自亲身勘测、调查与寻访，在官方还可以利用各地区汇总上报的材料，这不过是文献资料与调查寻访的延伸。因此，实地勘察与考订历史文献乃是编纂史地之书的主要方法。而历来历史地理著述，惟立足于文献考辨者甚多，其余虽亲身经历，但多属随机观察、零星记录之作而缺乏系统性。乾隆朝编纂《西域图志》所进行的实地勘察，则在目的明确、组织严密、规模宏大、技术先进的程度上超越以往。纂修中对历史文献的清理考订是十分认真、十分重视的，但清高宗有所指示："所有山川、地名，按其疆域、方隅，考古验今，汇为一集。咨询睹记，得自身所亲历，自非沿袭故纸者可比，数千年来疑误，悉为是正，良称快事，必当成于此时，亦千载会也。"[33]表明在将实地勘察与历史记载的对比分析中，更重于前者，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可贵的科学方法。

乾隆朝在西域广大地区形成的新的地理知

识，必然与传统的旧地理观念发生抵牾，其中尤以“分野”之说首当其冲。“分野”之说始于《周礼》，后历代经传、史籍多所叙述发挥，可谓源远流长且颇具权威性。其特点是用天空的星区比附各个地区，包含有统合天地、宇宙一体的意识，也为天人感应的迷信学说增添了了依据。《西域图志》初修本仍以《分野》立例，未脱旧说窠臼，但必然存在新知识与旧框架冲突的困扰。至纂修《四库全书》时期，清高宗为新辑佚的南宋人毛晃《禹贡指南》题诗并作注，郑重指出：“盖分野之说本不可信，而灾祥则更邻于谶纬。皆非正道。”[34]于是，《西域图志》定本作出重大修改，摈弃“分野”，设立《晷度》二卷，在科学性上迈进了一大步，修书史官写道：“若分野之法始于《周礼》，以星分辨九州之地而不及九州之外，其在四裔外藩，即以附近分野之星牵连统属……今西域拓地二万余里，欲以秦属井鬼之说统之，则井鬼之次，晰之至于无可晰，非通论也。伏读《御制毛晃〈禹贡指南〉诗注》，阐论雍州两星之难概伊犁、叶尔羌诸境，睿裁超卓，旷若发蒙，因灼然于古来分野之说之不可信。既数有所穷，亦理原难据，未敢因仍傅会，致滋歧误。”[35]

本来，何国宗率西洋传教士在新疆实地勘测，已经得出各地方位、北极高度、东西偏度、距京师里程、夏至、冬至的昼夜长短、午正日影等等数据，这些数据提交清廷的同时，还反映在传教士宋君荣于1757年（乾隆二十二年）11月14日寄往巴黎的信件，信中谈起傅作霖和高慎思曾到过哈密、巴里坤、吐鲁番、玛纳斯、博罗塔拉及伊犁等地，他们测量并计算经度和纬度，绘成了准噶尔地图。又列出地图中的十八个地点的地理即经纬度[36]，其数据对照《西域图志》卷六《晷度一》、卷七《晷度二》，几乎全部吻合，例如宋君荣列出的“巴里坤：北纬43°39′，经度23°0′；伊犁：北纬43°56′，经度34°20′；库尔勒：北纬41°46′，经度29°56′”，乃与《西域图志》的记载分毫不差。这表明《西域图志》定本抛弃“分野”观念，而独取科学的勘测结果，正如其《凡例》所称：“惟测晷影，定北极高度，距京师定偏西度，斯为准确。兹编所载高、偏度，皆命使遄往，随处测量，高下远近，略无爽漏……至分野之说空虚揣测，依据为难，故不赘及。”[37]这种从“分野”向“晷度”的转变，是清代官方在学术上科学态度的一次闪光，仅此一点，就足使本书卓然特立于学术之林，在中国地理学史和思想史的研讨中，皆值得格外关注。而遗憾的是，清廷后来却未能将之广为推拓、发扬光大，此中因由，同样值得探讨。

（二）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开山之作

西北边疆史地学是有清一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早已为研究者注意。“史地学”不应看成历史与地理学问的拼合，而是以地域沿革、地理考察为纲领，溶入社会历史内容的有机组成，其特点是系史于地、以史释地，《西域图志》就是这样的著述，虽为清朝第一部官修的新疆地方志，而又与许多按史书体裁撰写的地方志有所不同。因此，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）即已成书的《西域图志》，乃是清代第一部系统的西北边疆史地学著作。此前若梁份《西陲今略》，虽得自亲身考察，但内容仅及河西地区；若康熙间官修《亲征平定朔漠方略》等书，为条述战事经过之书，不属史地学范围，其余涉及西域的见闻杂记之类，支离零碎，不可同日而语。

学界论及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，往往以清嘉庆年间为起源时期，似乎无视《西域图志》的存在。例如梁启超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在叙述清代史学、地理学时，只字未提《西域图志》，认为洪亮吉在嘉庆时所撰《伊犁日记》、《天山客话》“实为言新疆事之嚆矢”[38]，疏失可谓极甚。后之论者多沿此错误思路，偶有谈到《西域图志》者，也一带而过，不予重视，其要害在于仅知私家学者的治学著述，不自觉地因袭了民国以来不承认清朝官方学术业绩的观念。

《西域图志》无疑为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开山之作，它对新疆地区的勘察记述，对历史文献的清理考订，对当代所有文献的汇总，就其全面性、系统性而言，不仅前所未有，而且后亦罕见，为西北边疆史地学奠定继续探索的基础。梁启超说：“清儒嗜古成癖，一切学问皆倾向于考古，地理学亦难逃例外。”[39]而《西域图志》纂修全过程的科学方法，弘扬起

边疆史地学研究的新风，在《西域图志》记述对罗布泊的考察中，即引发黄河之源的探讨，批评唐代杜佑、宋代欧阳忞等人的说法乃“徒以其所及见者，执此一隅，概彼全局，有如东面而不见西墙者矣！”[40]后来，清廷组织了实地考察，并将“所有两汉迄今，自正史以及各家河源辨证诸书，允宜通行校阅，订是正讹，编辑《河源纪略》一书”[41]，这是《西域图志》撰修方式的继续，官修《热河志》、《日下旧闻考》、《盛京事迹图》等等历史地理著述，亦皆采取《西域图志》这种立足实地考察，参订历史记载的研究方法，正如清高宗在《热河考》[42]一文所指出：地理问题记载参差，传闻驳杂，“苟非命使亲履其地，焉知此之为是而彼之为非乎？”这一史地学理念，通过乾隆后期官方多次勘察、纂修活动而影响广泛，为嘉庆朝官员祁韵士、徐松等人所祖述，清早期从文献到文献的地理考释之风习，发生了显著的转变。

《西域图志》修成，对私家学者产生启导先路的作用。约乾隆四十二年，满人椿园撰有《西域闻见录》（有《西域总志》等等别名）八卷，其《自序》称：“我皇上神圣文武，卓越前朝，西陲疆域，开扩万里……爰命帝臣辑纂《（西域）图志》，一时载笔之士，巨构鸿裁，煌煌乎辉耀千古矣。然里巷琐屑之事，殊方猥鄙之情，或弃掷而不言，或采择所弗及……余居其地最久，考究最详，于是不辞冗俚，作为是编。”[43]很明显是受到《西域图志》启示而编撰。

《西域图志》的内容被乾隆《大清一统志》新疆部分采用，嘉庆《大清一统志》亦因仍之，私家研讨西北史地学者鲜不从中得益。如徐松的《西域水道记》，也有关于诸地“晷度”的记载，[44]以“晷度”表示地理位置乃《西域图志》的精华，为《大清一统志》所袭用，徐松之书，岂非模仿有自？至于张穆《蒙古游牧记》，是一名著，而清末民初学者章梫则认为其内容无一字不出于嘉庆《大清一统志》。[45]按章梫之论其言太过，但从中取资则迹象难掩，间接受益于《西域图志》，自然亦不可否认。

清朝末年，官方编纂《新疆图志》，由当时新疆省组建通志局纂修，1911 年付印。其书达 116 卷、200 多万字。书前开列《西域图志》等 50 种参考书，[46]书内内容也多有引用《西域图志》且明文注出，更有辨正《西域图志》疏误之处。如《新疆图志》对《西域图志》关于“哈密”的辨正云：“案《西域图志》以伊吾与哈密音不相类，意扦采国人尝居此，因转托采为哈密……此益见《西域图志》之为凿空矣。”[47]至于《新疆图志》对《西域图志》引征之例，则不胜枚举，如《新疆图志》卷 62“库克雅尔山”条载：“《西域图志》，在裕勒阿里克东南，听杂布谔斯腾发源山中。”[48]可见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乃以官修《西域图志》起始，以官修《新疆图志》终结，前后二书呼应，后者承袭了前者。若此，《西域图志》的地位已不言而喻。

清乾隆朝平定西域并且极有成效地经营新疆，是对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。《西域图志》是清朝充满强盛、自信的精神状态下修成，贯彻维护和赞颂国家大一统的政治宗旨。在强盛的状态下，才最可能开创一方边疆史地的研究；在自信的心态下，才更可能提高学术品位与学术要求。这样的条件体现于《西域图志》的纂修，使之成为政治性与学术性结合的成功著述，尽管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和疏失，但不影响其总的价值和成就。时至今日，我们从史学史、民族史、地理学史、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等等各个角度研讨，这部《西域图志》都有重要的历史地位。

---

①《清圣祖实录》卷 183，康熙三十六年四月甲子。中华书局 1985 年影印本，后同。

②魏源：《圣武记》卷 4《乾隆荡平准部记》，中华书局 1984 年版，第 151 页。

③《清高宗实录》卷 593，乾隆二十四年七月丁巳。中华书局 1986 年影印本，后同。

④何国宗（？－1766），字翰如，顺天大兴人，清科学家，康熙五十一年中进士，官至礼部尚书。

⑤《清高宗实录》卷 490，乾隆二十年六月癸丑。

⑥康熙年间在西洋人参与下绘成全国性的《皇舆全览图》，乾隆时加以订补，是为《皇舆全图》。

⑦《钦定皇舆西域图志》卷首，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十

三日“上谕”。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年影印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，后同。

⑧明安图（1692 ~ 1763），字静庵，蒙古正白旗人，康熙年间参修《历象考成》等书，官至钦天监监正。

⑨《国朝宫史续编》卷 99《图绘一》，清高宗《题舆地图诗》自注。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点校本，后同。

⑩傅作霖、高慎思著有《1759～1760 年游记》（参见曹增友《传教士与中国科学》，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年版，第 238 页），记述此次经历，是测绘工作止于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）。

⑪《钦定皇舆西域图志》卷首，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谕旨。

⑫《钦定皇舆西域图志》卷首，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“上谕”。

⑬《钦定皇舆西域图志》卷首，乾隆四十七年《进书表》。

⑭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 68，史部地理类一。

⑮⑱㉓㊲《钦定皇舆西域图志》卷首，《凡例》。

⑯《钦定皇舆西域图志》卷 1《图考序》。

⑰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 68，史部地理类一。

⑲《钦定皇舆西域图志》卷 1，《图考·皇舆全图说》。

⑳㉒《钦定皇舆西域图志》卷 4，《列表序》。

㉑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 68，史部地理类一。

㉔《钦定皇舆西域图志》卷 21，《天山》。

㉕《钦定皇舆西域图志》卷 25，《水二·额彬格逊淖尔》。

㉖《钦定皇舆西域图志》卷 12，《疆域五》。

㉗《钦定皇舆西域图志》卷 29，《官制》。

㉘《钦定皇舆西域图志》卷 32，《屯政一》。

㉙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 68，史部地理类一，《钦定皇舆西域图志》提要。

㉚见《钦定皇舆西域图志》卷 13，《疆域六》。

㉛《钦定皇舆西域图志》卷 27，《水四·天山南路一》“博斯腾淖尔”条。

㉜《钦定皇舆西域图志》卷 14，《疆域七》“鲁克察克”条。

㉝《钦定皇舆西域图志》卷首，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“上谕”。

㉞见清辑本毛晃《禹贡指南》卷首，载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年影印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 56 册。

㉟《钦定皇舆西域图志》卷 6，《晷度序》。

㊱（英）约·弗·巴德利：《俄国·蒙古·中国》，上卷第一册，第 359 – 360 页。商务印书馆 1981 版。

㊳梁启超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北京中国书店 1985 年影印 1936 年中华书局出版本，第 321 页。

㊴梁启超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同上版本，第 320 页。

㊵《钦定皇舆西域图志》卷 27，《水四·天山南路一》“罗布淖尔”条。

㊶《国朝宫史续编》卷 91，《书籍·志乘》，《钦定河源纪略》条。

㊷载《国朝宫史续编》卷 91，《书籍·志乘》。

㊸椿园：《西域总志》卷首，《原序》。台湾文海出版社 1966 年影印本。

㊹见《西域水道记》（台湾文海出版社 1965 年影印本）卷三关于“党城”晷度的记载。

㊺章梫：《一山文存》卷 10，《题钞本道光重修大清一统志》。

㊻《新疆图志》卷首，《凡例》。台湾文海出版社 1965 年影印本。

㊼《新疆图志》卷 2，《建置二》。

㊽《新疆图志》卷 62，《山脉六》。